

# 河道总督 (连载)

林绍越想越得意,送走了这几位州里分管河工的下屬,他伏在书案上写奏折,一是揭发潘季驯与兼任淮安巡抚的江一麟二人实属于江西的旧交,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将河库银放在淮安府,增加了多道环节,滞留、克扣工程款项,或用于购买盐引,抬高盐价,从中渔利。二是潘河漕修筑河道外面的遥堤是不了解黄河的水性与治河的历史,黄河是堵不住的,修筑遥堤不仅劳民伤财,反而容易造成河堤进一步崩溃,应该保留黄河自徐州以下到入海口的决口,以求河道水势顺畅。

写完之后,林绍还抄给自己熟悉的御史和工科给事中言官,特别是与自己同年中进士的科道言官,这些朝里的言官都是可以风闻奏事的,这些言官不晓得治河的真机,却擅长指责干事的人,听说河漕工程竟然有这么大的猫腻,就到处散布“浮言”,扬言潘季驯治河必不可成,甚至贪赃枉法。

林绍又给杨化寄了一份,他知道杨化这个人比较滑头,不会跟着他一起上告,但是杨化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

果不其然,杨化没有自己写题本上奏,而是叫着张云、李五等盐商,从河漕总督府与淮安府拉人下水,作为外援,里应外合,不久,就把负责宝应段河道治理的河南郎中施天麟、淮安府负责结算河漕工程款项的通判王弘化拉进了河下老街的藏春苑,这里有扬州瘦马莺歌燕舞,有淮扬名菜滋润肠胃,两位大员当晚就和杨化、张云、李五结拜为兄弟,一切听杨化兄的调遣。河南郎中施天麟负责修复宝应一带的工程,他答应可以多报一部分款项,通判王弘化答应先把杨化、林绍、施天麟的三段河漕款支取出来一部分,供他们先期使用。

杨化自从到了淮安府,并没有其他的进项,这些日子的吃吃喝喝,都是张云、李五在请客,他一直很内疚。这不,通判王弘化转来的款项一到位,他立马回请诸位盐商兄弟,这水陆道场的档次自然又压过了张云一头,让张

云、李五直呼过瘾!

又到了三六九万历皇帝上朝之日,天刚蒙蒙亮,北京皇城内外钟声阵阵,大臣们已经在太极殿内外分班站好,万历皇帝在大太监冯宝的引领下来到御座上坐下,开始听政。

不料,几位科道言官站出来,纷纷参奏右副都御史、河漕总督、工部右侍郎潘季驯,与右副都御史、漕运总督、淮扬巡抚江一麟结党营私,治河无状,多筑遥堤,实属劳民伤财,并与巡盐御史一起勾结,哄抬盐价,应该严肃查办,让其“冠带闲住”。

在御座之上的万历皇帝看到这乱嚷嚷的情景,一时间不好表态,就问首辅张先生该怎么处理。

张居正为官多年,根本不相信这些言官的指责是真的,但是也不能不处理啊,就说:“圣上,如今河漕大工已经全开,河漕总督潘季驯和巡抚江一麟正奔波于治河工地上,千头万绪,一旦派人去查处,工程将会瘫痪!应该让潘季驯和江一麟分别解释,如果他们解释不清,或者确有问题,再查办亦不为迟。”

皇帝准奏,退朝之后,张居正把关于河漕方面的题本奏折分别转给淮安的河漕总督署和淮安府,让潘季驯、江一麟悉心部署好河漕工程,不能有任何的差池,对于这些官员的指责,可以在不忙的时候,逐条辩白,呈报上来即可。

潘季驯和江一麟正在忙着部署河漕工程的事,诸事繁杂,简直焦头烂额,这时,二人却分别收到了张居正写来要求解释问题的信,后面还附有林绍与各路言官的奏折,既感到压力巨大,也感到十分气愤: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二人在河漕上忙得焦头烂额,这徐州道副使林绍真是一个宵小之辈,早在河漕总督署给朝廷上《两河经略疏》的时候,他也是参与写奏疏的,后来进行工程分工的时候,分工就贴在了门口的大照壁上,他也没有反对啊!而到了驻地徐州之后,竟然暗下黑手,背后搅局,编造谣言,串联多名言官在朝堂上兴风作浪!

(未完待续)

## 荐书堂

主办单位: 济宁晚报 济宁亚龙书城



### 《爱情的样子》

本书刻画了24对革命伴侣的人生故事,让人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长河,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革命者的爱情,不仅仅是个体情感的交织,更是对未来的共同憧憬和奔赴。他们因志同道合而相爱相守,因信仰坚定而矢志不渝。这种爱情,超越了个人的小情小爱,成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

除了有深刻的内容,这本书的装帧设计也别具巧思。它采用了电影式的视觉叙事思路,以中国传统颜色的朱赭色为主基调,双栏排版,版式灵活多样。同时辅以秋叶元素,用“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展示了革命者的崇高人格与爱情的伟大。此外,全书还配备了音频、视频短片及电影,通过听觉、视觉全方位立体展现革命者那一段段因信仰而闪光的爱情,增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本报记者 王艳茹 整理)



杨义堂

元敕赐曲阜孔庙田宅记碑,为孔庙记事碑,立于元惠宗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十二月。此碑位于孔庙奎文阁西门北侧,石碑高2.1米、宽0.94米、厚0.22米。碑文正面共28行,每行51字。碑文由中顺大夫欧阳玄撰写,承仕郎赵期颐篆刻。碑文内容丰富,它记录了元朝对孔府的恩赐,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儒家文化的尊崇和重视。

元朝皇帝赐予曲阜孔庙田宅的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探讨。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其思想和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曲阜孔庙作为祭祀孔子的圣地,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象征。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元朝皇帝深知儒家文化在汉族及其他民族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为了巩固统治、促进民族融合,元朝皇帝采取多种措施来推崇儒家文化,包括设立国子监、推广儒学教育等。赐予曲阜孔庙田宅,正是元朝皇帝对儒家文化尊重与推崇的具体体现。

元朝建立初期,面临着汉族士民的抵触和反抗。为了安抚这些士民,元朝皇帝需要通过一些举措来显示对汉族文化的尊重和接纳。赐予曲阜孔庙田宅,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可以赢得汉族士民的好感和支持。元朝皇帝通过赐予曲阜孔庙田宅等举措,向天下宣告自己是中原正统文化的继承者,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举措有助于增强元朝皇帝的权威性和正统性,从而有利于帝国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为孔庙的日常运营和祭祀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些田地和房产的收入可以用于修缮庙宇、购置祭器、举办文化活动等,从



### 曲阜碑刻(三十九)

## 元敕赐曲阜孔庙田宅记碑

王俊毅

而保障孔庙的正常运转和儒家文化的传承。

曲阜孔庙在元朝文化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曲阜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圣地,承载着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传承。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促进民族融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崇儒家文化,其中,对曲阜孔庙的重视和支持是重要的一环。元朝皇帝多次赐予曲阜孔庙田宅、修缮庙宇,并设立专门机构和官员来管理孔庙事务,这些举措都体现了元朝官方对曲阜孔庙的极度重视。这种官方重视和政策支持,使得曲阜孔庙在元朝文化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和突出。

曲阜孔庙不仅是儒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圣地。在元朝时期,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曲阜孔庙成为各民族共同敬仰和祭祀

孔子的场所。这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现象,在曲阜孔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元朝统治者通过推崇儒家文化等方式,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曲阜孔庙不仅是祭祀场所,还是儒家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儒家经典被广泛研究和传授,儒家思想被不断阐释和发扬。这种传播活动对于儒家文化在后世的普及和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曲阜孔庙在历史上形成了学庙合一的体制,即孔庙与儒学教育机构相结合。这种体制使得儒家思想在教育中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场所和资源。许多儒家学者在孔庙中研究经典、探讨学术,推动了儒家文化的深入发展。曲阜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象征,吸引了大量学者和士人前来参观学习。这种学术氛围促进了儒家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许多重要的儒家学术成果都在孔庙的学术氛围中孕育而生,为后世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爱、礼义、诚信等价值观念,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曲阜孔庙通过祭祀活动、教育传播等方式,将儒家的价值观念传递给后世子孙,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人观此碑记,无不感慨万分。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瑰宝,需要得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尊重和传承。同时,我们也应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儒家文化,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